

簡介清末中國知識份子的反教運動背景

馬振愉

(一) 引言

基督宗教 (Christianity) 傳入中國雖然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但其正式而直接的與中國接觸則始於明末耶穌會士的東來，由利瑪竇發其端緒，建立中國教會。雖然到了清初一度被禁，但百多年後，即鴉片戰爭以後，旋又重新被中國政府認許，准其在中國沿岸五個海口流佈，中國教會的門戶，乃重行開放。(1)

中國教會自十七世紀建立初期開始，即已遇到了風浪，反教言論自利瑪竇抵達北京後即已出現；其後由於禁教而稍為沉寂；但到了鴉片戰爭以後，尤其以一八六零年的中英北京條約，中法天津條約為起點，反教言論四起，教案不斷在各省各縣發生，造成不少中外的衝突。教會既以傳福音、愛世人為宗旨，何以會造成這些衝突？這篇短文所要探討的便是這些衝突的原因與背景。

基本上，清末（一八四〇至一九一〇）的反教言論中心有兩點：第一是儒家傳統的自尊自崇，使知識份子蔑視基督宗教並加以拒斥。第二是因為自鴉片戰爭以來，傳教的問題與西方烈強的政治與軍事結合，蒙上了侵略的色彩。前者是自明末以來，一直為反教的知識份子所樂道的，後者則只是一八四零年以後才明顯的與第一點在反教言論中出現。

(二) 背景之一

自漢唐以來，傳統的儒家思想在中國的知識份子的心中所佔的地位都是至高無上的，以為凡是一切宗教、道德都不能與之相比；行仁義，講禮讓，說廉恥便是世上最高貴，最全面的道德學說，諸子百家，均是異端的或是片面的，因此儒學是諸學之正宗，也是世上所有的人要尊崇學習的；而中國的知識份子便以擔當着保存並發揚儒學為職志。誠此，一些開明的知識份子如徐光啓、李之藻等對儒學的態度固然是尊崇無異的，但對諸方外人的風物信仰也並沒有存着低藐的心態；可是這類人畢竟佔小數，而佔大多數的，往往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頑固的知識份子，他們以自尊自大的情操，毫無保留地評貶外來的事物；若要他們拿自己與西方人比較，則可用以下的一句話作總結：「華夷之別與人禽之辨」。而在一般人的心中，這個道統，既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至孔孟而大成，是為二千多年來中華民族傲視於四方蠻夷的中心觀念，因此只有「夷人入中國，則中國之」，而未嘗有以夏變夷之理，亦即是尊王攘夷，保衛孔孟聖教的民族文化而拒斥蠻夷文化。

孟子說：人皆有惻隱之心、是非之心與羞惡之心。這是基本的人性；但人亦包括有自私、貪婪與殘忍的劣性。而一個完全的人是能夠制止其劣性而發展其人性的，即以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來發展其人性，由個人內心做起，推廣而及於天下，即是「正心，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因此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均有一定的秩序倫常，尤其以忠孝的觀念來維持國運家道的中心思想。因此以下犯上是為不忠，不敬先祖是為不孝。無君、無親，便是孟子所說的「有類於禽獸」。

以上兩點都是一般盲目固守儒家道統的知識份子用來區別中外觀念的理由。利瑪竇等到中國時，亦受到這種夷夏之防的蔑視，因此他所傳的宗教亦遇到反對言論。如徐昌治所訂的《聖朝破邪集》卷二載施邦曜福建巡海道告示云：

本道細閱其（天主教）書，大槩以遵從天主為見道，以天堂地獄為指歸。人世皆其唾棄，獨有天主為至尊。親死不事哭泣之哀，親葬不修追遠之節。此正孟子所謂無道、無君、人道而禽獸者也。其為邪說惑人，明白易見。……本道庭問（黃）尙愛等以縱款之故。則云：中國自仲尼之後，人不能學仲尼；天主入中國勸人為善，使人人學仲尼耳，夫仲尼教人慎終追遠；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寧有親死不哀，親死不奠，而稱為仲尼之教者夫？且極詆中國親死追荐之非，既從天主便生天堂，春秋祭祀俱屬非禮，是則借夷教以亂聖道，真為名教罪人！……是不但人道等於禽獸，必至夷狄而亂中華，誠時事之大可慮者也。(2)

雖然明末耶穌會士利瑪竇等在中國建立的教會，經歷了無數的猜忌與苦難，由剃頭披架娑而至於脫下僧袍改穿儒服，並精研中國典籍，作為交結當時社會裏的上層人士，包括士大夫、貴族官員及儒生的資本，並經過了無數的論辯與解釋，才在中國建立了信德的根基。但基於上述的思想背景及言論，南京禮部侍郎沈澹在利瑪竇死後六年（一六一六）便會對在華的天主教會發動了一次猛烈的攻擊，逮捕了王豐肅（Fr. Alphonse Vagnoni）、謝務祿（Fr. Alvare de Semedo）等教士及中國教民二十餘人，造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教案——南京教案。造成教案的特殊原因是因為利瑪竇在世時，因曾與無數的佛教高僧論道，並屢次使他們啞口無言，難以對應，而造成教會與佛教徒之間的宿怨，沈澹便為一虔誠的佛門子弟。

到了清初，楊光先發動了「欽天監教案」（一六五九）反教言論亦陸續出現，如繼《破邪集》的《不得已》。楊光先的《辟邪論》說：

夫天，天氣之所結成，非有所造而成者也。設果有天主，則覆載內四海萬國，無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需獨主和德亞一國之理。獨主一國，豈得稱天子哉！既稱天主，則天上地下，四海萬國，物類什多，皆待天主宰制。天主下生三十三年，誰代主宰其事？天地既無主宰，天亦不運行，地亦不長養，人亦不生死，物亦不蕃茂，而萬類不能息乎？天主欲救亞當，胡不下生于造天之初，乃生于漢之元壽庚申？

楊光先在這裏所提出的反教言論，則是以基督教本身的教理加以斥駁，這方面的言論亦佔反教言論基礎的一環，但由於這些知識份子對基督教神學的傳統缺乏認識及瞭解，因此被認為是無識的誤解，但却成為日後知識份子反教思想的先入為主的觀念。(3)

(三)背景之二

鴉片戰爭是英國在工業革命以後，在遠東擴張工商業市場，爭取資本的結果，主要媒

介是藉着中國的禁鴉片而開始，英國首先向中國開火，打開了中國二千年來緊閉着的門戶，強迫中國簽訂《南京條約》——是為不平等條約之始。

雖然這個條約與傳教問題無關，却間接引起了正在擴張中的法美兩國的效尤，乃有《中美望廈條約》（一八四三），及中法《黃埔條約》（一八四四）的簽訂。在這兩條條約裏，除了英國所得的利益外，加上了外人有在五口岸的傳教自由，並由政府加以保護，其原意，本是為了加速播福音與免除教士與教民的被迫害而已，但却產生了一意想不到的惡果，即使到教會被視為外國政府所支持的外國機構。華因雪斯(Dr. Warshimo)說得很透徹：

固然，依法外國只能作為教民的信仰保護者來實行干涉，但實際的結果，是把教民和他們的廣大同胞分開，使他們成為外國人保衛下的獨立王國。這種情形是這樣明顯，以致使中國官府一直很不聰明的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中國人民在名稱上嚴加區別。……這些宗教自由條款，嚴重的打擊了中國國家的威信和主權，因為它們在實際上使中國基督徒不受中國的管轄。在這些條款下，教士作為侵略性的西方之一部來到中國，依仗著使用優越的軍事力量從中國政府所奪來的協定。因此，他所要宣傳的『福音』，就不能不受到影響，他的天主也不能不為人所誤解。(4)

這個分析，無疑是很恰當的，不過促成傳教問題加入到不平等條約中也是有其迫切之情的，那是西洋人急欲使基督宗教在中國取得合法的地位所致；其次是歐洲人本身發展出的對外思想所致；在軍政方面，是擴張領地及國力，在宗教文化方面，則是向亞非傳揚「福音」，是一種文化的誇耀，也是一種文化侵略的基礎，那是流行着的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名言：「白種人的負擔」（White Man's Burden）。在這個思想背景下，從西方帶到中國來的教會很自然便成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

到了咸豐末（一八五八至一八六二）年，英法聯軍進京，帝走熱河，並簽訂天津北京條約。同治初（一八六二），王炳燮檢討這次戰役的結果認為條約的簽訂是外「以通商廣取中國之財利，以傳教陰結中國之人心。」他並就中國鄰近亞洲國家所受列強侵略的情況，加以說明，而後提出論斷：

傳教一事……英法吞噬海外，率用此謀。一行其技於噶嚨吧（爪哇），再逞其技於呂宋（菲律賓），又幾售其技於日本，又大肆其技於印度。(5)

在湖南闔省公檄中，也有相似的看法：

（基督教）當日之行利末亞洲（非洲），而利末亞洲為其所屠矣！行之印度，而印度為其所併矣！行之日本，而日本為其所亂矣！我中華之庶富，千百倍於諸夷，彼心涎已久。今茲之來，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可知者也。不亟防維驅除，將數千年衣冠禮義之邦，一旦易為獠獠狃狃之域，大可恨也。(6)

這種被中國知識份子認為西方人藉基督教來從事侵略的思想在往後的三、四十年間，並沒有稍減，反而是變本加厲。自同治至光緒（一八六二至一九〇八）年間所發生的教案數目之多，可說是前所未有，因為在同治以前（指道光至咸豐）（一八二一至一八六一）反教言論與教案亦發生了不少，只是當時門戶初開，在新敗之餘，又發生了太平天國之亂

與稔軍之亂，另有無數地方性的小動亂，民間知識份子對政府不滿遠超過對西教不滿。可是到了同治光緒，中國政府承認了技不如人，提出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自強口號；民間的暴亂經過了廿多年來接連的失敗，開始沉寂了，但英法聯軍之役及條約的簽訂，旋又使國人與知識份子的不滿情緒鼓動起來並轉向西洋人。政府的軍力既不如人，腦海裏又不能承認洋教勝過儒家，加上一些洋商、洋官及部份教士教民的橫行，乃使教會成爲衆矢之的，民教的對峙遂成白熱化。

光緒年間（一八七五——一九〇八）的反教言論，所強調的仍是教會爲西洋人侵略中國的前驅。光緒末年（一八九〇——一九〇八）周漢與余棟臣的言論足可以爲代表。如國漢的「擎天柱」說：

諸島君臣士庶，有稍識倫常者，概不從此猪教，拜此猪精。惟謀奪鄰國疆土，則必借此爲煽惑民心，勾結內奸之勝策。歷來各小島遭強鄰吞噬者，莫不由斯，不勝枚舉。考之書，訪之人，一一吻合，洞然無疑。危哉，島夷之用心陰賊險狠，乃至於此。是不特借傳教陷害我大清民人，直欲借傳教窺竊我大清社稷也。(7)

余棟臣說：

今洋人者，海泊通商，耶穌傳教，奪小民農桑之生計，發大聖君臣父子之倫，以洋烟毒中土，以淫巧蕩人心。自道光迄今，其焰愈張，其勢愈暴。(8)

這樣，所有基督徒便成爲中國紳民、知識份子的死敵；何況在道咸年間的（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八）「太平天國」，响着了上帝、基督的名號，造成了全國的大動亂，基督教會的政治性侵略便有了例證。即恭親王在咸豐八年便以洪馮之亂爲反對准許天主教在北京及各省流佈爲理由。(9)在民間方面，湖南的衡陽，清泉西省的紳民在請求驅逐天主的公呈中說：

……髮逆因假耶穌名號，揭竿而起，縱橫粵、閩、黔、蜀、江、鄂、皖、豫、齊、陝，流毒半天下，不可收拾矣！至庚申八月之變，普天同憤，而逆夷亦遂明目張膽，連衡勾結，四野騷動，人情洶洶，將不知何所底止。(10)

江蘇的無錫與金匱兩縣儒學，於太平軍戰事期間被燬。收復之後，經官紳籌劃重建；於重建碑記中說：

自古世變之生，皆由於人道之不立。……即如粵賊倡亂，謬稱天父，以隱附於泰西天主之教。今賊既滅絕，而彼教方肆行於中國，以惑人心。(11)

(四) 總結

平心而論，清末的教會多多少少都與政治牽上了關係，這個可從十九世紀西方的思想界及其步上現代化的發展路向上來探源，不過在芸芸的西方傳教士中（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大部份都懷抱着福音精神，默默耕耘，雖然反教事件不斷發生，也威脅到他們的性命，他們還是一批接着一批踏入這塊土地，爲配合福音的推廣工作，他們開辦學校，翻譯書籍，編印報刊，作爲傳播西方的文明與思想的工具，甚至把西方的民權思想帶到中土來

，促使了中國的政治改革；並倡議禁煙，放足，提高婦女地位，以改良社會風俗；這在當時或者是不容易被按納的，或者說是中西思想的迥異吧，但近代的宗教家與哲學家對基督教與儒家思想的深入探討後，所發現的衝突並不如明清的反教言論強烈，而且在細考這些反教言論後，發覺激情與民族主義的成份居多。根本上是知識份子對儒家思想過份的執着而妨礙了溝通，因此可以說這是一個盲目的誤解。另一方面，這些關切國運的知識份子目睹基督教隨着外人的武力，深入中國腹地，又熱鬧許多亞非國家，相繼淪亡於這些信奉與支持基督教的國家之手，而中國所遭受的侵凌，又正有加無已，他們焉能不對外人傳教的用心，發生懷疑與恐懼。

無論如何，十九世紀的中國教會已成過去，過去的問題在於中國知識份子對傳統思想的執着與抱殘守缺和瀟灑十九世紀西方列強的擴張思想；今天，前者的思想已不能存在，後者則因列強的互相制衡而不能再發生，那麼現代化的中國教會所面對的問題是什麼？

附註

(1)五個海口為：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

(2)見徐昌治訂《聖朝破邪集》卷二

(3)見《辟邪紀實》

(4)見呂實強著：《中國官紳反教原因》P.62

(5)見王炳燮著：《毋自欺官文集》——《上湘鄉曾侯相書》

(6)見中國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教務檔》第一輯——江西教務。

(7)見《教務檔》——湖南教務。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總署收德國公使巴德蘭函附件。

(8)見民國重修《四川大足縣志》卷五——余棟臣傳。

(9)見《國朝案遠記》卷三十：「近年沿海地方，業為〔天主教〕所惑，即粵送藉耶穌以感人心，京師首善之區，若遭蠱惑，則衣冠禮樂之族，夷於禽獸」。

(10)見《辟邪紀實》

(11)見《教務檔浙江教務》光緒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總署收法國公使白羅呢函及附碑記

參考之期刊及論文。

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Mass., 1963

呂實強著：「中國官紳反教原因」（1860-1874），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叢書之十六，台灣，1973年再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教務教案檔」

金漢昇：《清末反對西化的言論》——「嶺南學報」五卷三至四期

李恩涵：《同治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大陸雜誌」三十五卷三至六期

呂實強：《晚清中國知識份子對於基督教義理的關斥（1860-1898）》——師範大學歷史學報 第三期

呂實強：《晚清中國知識份子對於基督教在華傳教的疑懼（1860-1898）》——師範大學歷史學報 第三期

呂實強：《晚清知識份子反教言論的分析之一——反教方法的倡議（1860-189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四期

呂實強：《周漢反教案（1890-189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二期



△ 利瑪竇研究小組聚會

參考書籍 ▽

▽ 剪報及分類

